

内 容 摘 要

自 1861 年开埠,汉口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化都市的快速转进。伴随着汉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文化娱乐业也在这种社会的变迁、冲突中开始了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发生在文化娱乐业领域中所有组织结构的变化、观演关系的变革、经济理性的成长,乃至对江汉平原文化艺术发展格局的影响,都包含在汉口都市近代化进程之中。在中国近代化的宏观视野下,汉口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进程被赋予了全新的解释和价值意义。

本书认为,晚清汉口的崛起,已经完全不同于农耕时代江汉平原上诸如荆州、襄阳、鄂州等传统区域文化中心,它使整个江汉地区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型的经济文化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江汉平原上传统艺术品种常规发展的轨迹,即由明清时期汉口与江汉平原上其他城市的并行发展模式,向集中发展模式过渡。江汉平原上流行的文化娱乐样式开始向汉口集中,而一些未能进入汉口、被排斥在近代都市进程之外的文化娱乐形式,则开始了其衰落和被淘汰出局的过程。

晚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文化娱乐市场上引发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这种商业竞争对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娱乐品种而言是一种生存竞争,它使得近代都市中的文化娱乐样式以比在农业社会中快得多的“速度比”发生变化。某一种文化娱乐样式能否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并不完全受艺术品种本身艺术价值高或价值低所左右,它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特点、人口结构、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文化娱乐业作为汉口城市近代化的一个方面,在民国时期完成其由传统到近代的蜕变,主要表现为:利益理性的成长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娱乐业管理价值取向,推进了文化娱乐业的运作方式的

市场化、商业化,原来与古代社会中的特权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等级文化消费模式”发展成为以金钱而非身份等级为决定因素的近代“大众文化消费模式”,文化娱乐业组织的“利润目标”代替了传统的“伦理目标”。利益主体的形态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化娱乐业的组织技术,加速了文化娱乐业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使具有近代行业组织特征的戏剧公会代替了具有祭祀组织性质的老郎庙会,近代经理制代替了传统的班主制。

晚清到民国,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定型的过程。开埠之后,汉口的城市功能结构中生长出一些封建城市所没有的“公共领域”。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作为“准公共领域”,被纳入政府公共管理的范畴。民国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经历了一个由探索、试验、修正和逐步定型的过程。它的基本轨迹是,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是由“以禁为管”封堵型管理模式向以“内容审查”为特点的许可证管理模式发展。

作为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娱乐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轨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相伴随。文化娱乐业因兼有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商业价值)的双重特点,给人们测度中国都市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考察视角。从根本上说,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潜在空间,但大众文化娱乐固有的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传播方式的直接性,使得作为一种“权力”的文化欣赏、文化传播和文化评论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这对于造就一种有别于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近代市民文化传统,促进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成长发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Abstract

Since the trading port opened in 1861, Hankou turned into a modern city from a traditional commerce town. CRB (culture recreation business) followed the changing steps of Hankou's social economy structure. CRB's changes, such as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transi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yers and spectators, establishing of profit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art in Jiangnan Plain, illustrated Hankou's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n the macroscopical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explanation and value of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Hankou's CRB is renewed.

Hankou developed greatly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forming a radiated economy culture network which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ent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Jinzhou, Xiangyang and Ezhou situated at Jiangnan Plain in agricultural era. I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track of the traditional art kinds in Jiangnan Plain, Hankou's CRB transitioned from keeping parallel with other towns in Jiangnan Pla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o concentrating. All kinds of CRB types began gathering together to Hankou. Some of which couldn't enter into Hankou were repelled out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 started declining and being eliminated. It caused such a great competition in CBR market that the commodity economy had gained a high-speed development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was a real existing competition for any types of CRB, so CRB sorts altered rapidly. An art kind's competition advantag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its worth of art but were affected by some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level,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structure, political surroundings, etc.

As an aspect of city modernization , Hankou s CRB had finished its degenerating from tradition fashion into modern one during Minguo period , which was presented in three aspects : First , growth of profit reason changed the concept of value of traditional CRB controlling. Second , the operating method promoted CRB into the market , “ Grade Culture Consumption Mode ” in ancient society was replaced by “ Popular Culture Consumption Mode ” in modern society. Third , profit target replaced traditional ethics target in CRB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profit subject changed organization s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RB and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of CRB 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dure , the modern players association replaced the old Joint Group , manager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masters.

From late Qing to Minguo ,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CRB experienced a course of discovery and finalization. After the trading port opened , there was public sphere growing in Hankou which was under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ve mode of Hankou government experienced a course to be sought , tested , corrected and fixed step by step. Finally , Hankou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mode of license-management to CRB.

As a part of Chinese city s modernization , the transition of the popular CRB mod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followed the steps of China s modernization. With double features of culture (ideology-value) and economy (commerce-value) , CRB can offer a special view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ty s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RB was limited by economy level , but as CRB s popularization of spreading mechanism , directness of spreading method , the diversity and generalization of CRB could supply citizen the right of choosing entertainment and art criticizing. They set the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independent from the public power , which benefits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

目 录

序	1
导论 汉口文化娱乐业的研究对象及其构架	7
一、文化娱乐业的研究对象	7
(一)娱乐、娱乐业与文化娱乐业	7
(二)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内涵	13
二、汉口文化娱乐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16
三、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研究现状述评	21
四、汉口文化娱乐业研究的理论构架	34
(一)近代文化娱乐业的两种研究思路	34
(二)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研究结构	44
第一章 汉口的兴起与江汉平原文化艺术发展格局的裂变 ...	47
一、汉口开埠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	47
(一)近代汉口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	47
(二)文化艺术格局的裂变:从平行共进到归并集中	55
二、汉口社会对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催生与孕育	62
(一)汉口市民社会的形成	62
(二)新式剧场的兴起	75
(三)近代传播体系的构建与确立	88
第二章 步入大众文化娱乐多元化时代	98
一、汉剧在汉口舞台的成熟与式微	98

(一)皮黄合奏与汉剧的形成	98
(二)汉剧在汉口舞台上的成熟	101
(三)汉剧的式微与改革	111
二、楚剧进入汉口	121
(一)地方乡土小戏挺进近代都市的艰难历程	121
(二)都市文化对楚剧的改造与提升	128
三、“新剧”登上汉口舞台	140
(一)近代汉口话剧发展的两个高潮	140
(二)1927 年以后话剧的淡出和向学校转移	156
四、近代电影业的兴起	162
(一)民国汉口电影业的产生与发展	164
(二)民国汉口电影业的一个缩影： 陈松林及其上海大戏院	175
五、茶馆与曲艺	179
(一)汉口的茶馆	180
(二)汉口的曲艺	187
 第三章 民众乐园与近代汉口娱乐业的曲折发展	195
一、“汉口新市场”：草创和发展(1919.5—1926.12)	195
二、“血花世界”： 革命的政治文化中心(1926.12—1928.5)	201
三、汉口民乐园：公共娱乐业 管理方式的探索与定型(1928.5—1930.12)	205
四、兴记“新市场”： 民办体制的重建与复兴(1931.1—1938.10)	209
五、明记“新市场”： 沦陷时期的经营(1938.10—1945.11)	210
六、和记“民众乐园”： 战后接收和维持(1945.11—1949.6)	211

第四章 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	213
一、封建专制下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的管理	213
二、民国政府探索近代文化娱乐业管理方式的尝试	220
(一)民初政府寓“管”于“禁”	220
(二)戏剧审查委员会的设立	226
(三)民众教育馆的设立与曲艺改良	237
(四)汉口市政府对外侨从事娱乐行业的调查	239
三、民国政府对近代文化管理体制 进行探索和试验的价值评估	243
第五章 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247
一、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市场运作方式	247
(一)商业效益目标指向	247
(二)演员职业化	255
(三)大众娱乐与大众传媒	260
二、文化娱乐业组织形式的变迁	274
(一)行业性组织形态:从老郎庙到戏剧同业公会	274
(二)营业性组织形态的变迁:从班主制、集体制到明星制	291
余论 大众文化娱乐业发展与城市近代化进程之关系	302
一、近代大众文化娱乐主流形式的变迁:以汉口为例	302
(一)中国大众主流娱乐形式流变概略	302
(二)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轨迹	304
二、文化娱乐、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生长	317
(一)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近代私人领域的成长	317
(二)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近代都市公共空间的成长	322
(三)大众文化娱乐业与社会动员	339
参考文献目录	352
后记	363

序

有些经常挂在口头的词语,却经不住认真推敲。即以“文化娱乐”为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就未能收入,想必是感到语义不够清晰,难以找到准确的对应英文词语。1979年出版的《词源》倒是收入了此词,但释文却过于简略:“简称文娱。包括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游戏等活动。内容健康的文化娱乐,不仅有利于群众身心健康,且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不包括运动如登山、打球?可能是已把它列入体育项目,但三五好友相邀打打乒乓球或保龄球,用时髦语言来说就是以“球叙”为休闲,难道不也是“有益于群众身心健康,且有一定的教育作用”的文化娱乐吗?

说到休闲,《辞源》的释义更使许多当代人蒙一头雾水,说是“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此处指的仅仅是土地的休闲,而不是人的休闲。稍有文化的农民和关心农业与生态环境者对此当然是耳熟能详,但现今众多城里人早已把“休闲”当作文化娱乐的同义语,一定会对这条释文深表遗憾。幸好《辞源》在“休闲”后面收有“休沐”一词,释文说:“休息沐浴,指古代官吏的例假”,并引《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一语为例,同时还引用了王先谦的补注:“《通鉴》胡注:‘汉制五日一下里舍休沐。’”古代中国文明昌盛,国家典章制度完备,公务员每工作五天休息一天,比近代西方每周休息一天的制度还要先进!此词倒与现今的“文娱”一语关系密切,而且早已从“沐浴”发展到“沐头”、“沐足”,可惜“休沐”毕竟过于古奥,所以只有让“休闲”流行一时。当代人休闲、沐浴无非一碟小菜,更喜欢的是出外旅游,君不见“黄金周”举国若狂,车船紧张,航班爆满,山川名胜到处人海如潮。而1979年出版的《辞源》又偏偏没有把“旅游”列入“文化娱乐”的释

文。但我认为这不是编者的疏漏,更不属于水平限制,只能说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文化消费意识日益增强,文化娱乐的现代化进程已如风驰电掣,约定俗成的相应新词语更是数不胜数。

在我看来,“休闲”与“娱乐”本是同义语。娱乐休闲是对劳作的替代,是人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娱乐休闲与劳作在时间上的分配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活水平的高低。就当代社会而言,近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推进了休闲社会的到来,娱乐休闲已经成为一种日益发展壮大的产业模式和经济形式。

文化娱乐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娱乐休闲浸润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游戏天性都会通过人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一种文化样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取向,甚至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过程。娱乐休闲既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经济性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它的价值不在于为人们提供物质形态的财富或实用工具技术,而在于为人们的单调和灰色的世俗生活建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娱乐休闲借助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价值建构而为人们建立起一种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或超越的生活方式。人们因此可以通过娱乐休闲而不是通过工作来展示个性和自我价值。从更高的层面来讲,娱乐休闲对社会具有校正、平衡、补偿的功能,能够为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一种文化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现代社会早就把文化娱乐纳入到体验经济或曰娱乐经济的范畴。人们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既被看作是一种体验的过程,同时又被当成是一个消费的过程。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的生存性消费(如衣食住消费)基本得到了满足,发展性消费(如教育消费)和享乐性消费(如文艺表演服务、上网服务等)日益成为现代人们追求的主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娱乐休闲服务及其相关产品日益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核心,为娱乐休闲而进行的各类生产和服务活动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娱乐休闲行业因而具有了现代产业的基本属性。

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娱乐休闲社会的到来引发了当代社会

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的变革。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正如周冰先生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文所曾指出:“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大增加。休闲时间的增加,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文化产业主要生产的是精神财富,相应地它所满足的主要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而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需要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不但成为当代社会人们的普遍需求,而且已成为世界产业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大趋势的使然,全国各省市掀起了一个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热潮,我也曾多次应邀参加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咨询会议,接触各方面有识之士,了解许多实际情况,也提高了对于文化产业的认识。

在近代史上,娱乐休闲与都市化是分不开的。娱乐休闲行业的发展与市民群体的膨胀、城市的扩张、城市近代化因素的积聚关系尤为密切。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居民对娱乐休闲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持续增长之势。在这种市场需求的强力推动下,近代城市逐步建立健全了它的娱乐休闲体系,如现代剧场、现代美术馆、现代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而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城市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由传统向近代的转进。近代都市与近代娱乐休闲行业之间缔结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到娱乐休闲业的组织方式、活动的时空特点和文化消费方式,可以说是近代都市化造就了近代的娱乐休闲业;另一方面,娱乐休闲业的发展水平同时又成为一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娱乐休闲本身是近代城市经济领域的核心要素之一,娱乐休闲活动本身构成了城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授受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近代娱乐休闲业的发展对近代城市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意义领域,它是一种“身边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大众文化传播的优势,使娱乐休闲充满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使文化的氛围弥漫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特别是近代都市中娱乐休闲商业开发模式的出现,促使“文

化”溢出少数精英的小圈子,以娱乐、休闲和参与的方式构建了近代城市社会的公共领域,提升了近代都市的社会参与性、亲和力和共享度,而这正是近代都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经营城市”的大背景下,各地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城市文化特色的营造。娱乐休闲行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城市名片”,代表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性格,因而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在这一领域,上海走在全国的前列,上海众多的专家学者汇聚在一起,研究上海的海派文化特色,数年以来,蔚然而成大观。与“大上海”相比,“大汉口”(大武汉)显然是落后了。这种落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落后,也是文化上和学术研究上的落后。但令人欣喜的是,在当前湖北省和武汉市努力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的大背景下,武汉地区学者已然有奋起直追之势,形成了一个以武汉城市为研究中心的学者群体,出现了一大批以武汉城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高水平的成果。如在武汉文化史研究方面,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动员和组织全省力量,20年间共编撰完成湖北省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和《武汉市志·文化志》,内容涉及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科班、演出班社、票房)、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等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武汉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向交叉研究方向发展的可喜态势。

因此,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傅才武博士的书稿——《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4—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作者将本书分为绪论、余论、正文五章,共7个章节,有30多万字的篇幅。内容涉及近代武汉的经济结构、武汉的政治文化环境,各种艺术样式的演变过程。此书迎难而上,对文化娱乐业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理论构架等重大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与明确的回答。如关于“娱乐业”的概念,作者认为:“‘娱乐业’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的提出,必然要以‘非职业生活’为其隐含前提”,而“文化娱乐”则是“人类游戏天性的艺术化表达。”并且在“导论”中作进一步阐述:“‘游戏’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也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就娱乐来说,它本是人生的一

大题目，是人在‘谋生’基础上‘乐生’。人类基于‘谋生’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基于‘乐生’的目标发展艺术，所以‘科学与艺术’构成人类文明的‘双翼’。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游戏’形式配上现代科技手段，使人类的娱乐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有少数人占有到多数人占有，到近代最终出现了一种多元化发展格局。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娱乐格局的存在，……伴随着近代都市化进程，从艺术进步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现代性’，对古老的中国由传统政治模式折向现代政治模式具有积极的影响。大众文化娱乐业中所固有的自由、民主和科学观念对近代公共舆论的建构和发展，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作用。”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力图以大文化的视野，并且把汉口的文化娱乐业纳入社会近代化的总体过程中来加以审视。他不仅探讨了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演进与汉口近代城市发展之关系——汉口作为近代城市的兴起与江汉平原文化艺术发展格局的裂变对汉口大众文化娱乐多元化进程的影响，而且还深入讨论了近代中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娱乐业管理方式的演变历程，以及完全市场条件下文化娱乐业本身的市场运作方式，如商业效益目标指向、演员职业化和终身化、大众娱乐与大众传媒的共谋模式，乃至艺人组织从行业性到经营性组织形态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书对于武汉民众乐园所作的个案研究，以及有关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私人领域、公共空间、社会动员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都能引人入胜。本书立足于近代汉口，通过对文化娱乐业史料的分析、总结、归纳，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路径进行推演，形成了一些共性认识，诸如文化娱乐样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市场环境下的文化管理模式较之于民办文化管理模式绩效比较、政党政治与变动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成长等，这些问题均是目前艺术学、文化史学研究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并且颇有创发，是本书的一个可贵之处。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是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出发来研究近代娱乐休闲活动，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化娱乐和休

闲现象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见。娱乐休闲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持续深入赋予娱乐休闲行业新的学术价值,也启发了作者新的研究视域,因此,如果把近代武汉文化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放到文化产业研究的范畴内考察,那么它的价值意义可能得到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对当前武汉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文化特色的建构也不乏参考价值。我个人以为,尽管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经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基础上确立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式,但如果不能得到管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支撑,文化产业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入。傅才武博士的研究项目正是力图以近代武汉为支点,从一个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市场体制条件下作为城市文化产业的近代娱乐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为文化产业在微观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区域性研究范例。因此,此书的出版应该有助于整个文化产业研究的深入,并且为湖北和武汉的文化发展提供若干借鉴。

作者在湖北省文化厅工作多年,对于文化产业有较丰富的经验积累,近年来又有许多新的理论探讨,因此这本书既显学术功力又没有学院式的蹈空,可以看作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连接的新成果。当然,由于我国有关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滞后,许多重大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书作者虽然勇敢地表述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见解,但却不一定已经臻于成熟,其中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譬如近代娱乐休闲作为一种产业研究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仍嫌欠缺,对文化产业化,特别是文化艺术进入市场运作以后的许多负面效应,似未给以足够重视与必要论析。不过筚路蓝缕,开拓之作贵在创新而不必求全,即令抛出的是引玉之砖,必有其无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存在。

文债丛集,思滞笔钝,缀此数语,聊以为序。

章开沅

乙酉端午于实斋

导论 汉口文化娱乐业的研究对象及其构架

一、文化娱乐业的研究对象

(一)娱乐、娱乐业与文化娱乐业

本文既然以文化娱乐业的研究为题,对“娱乐”、“娱乐业”和“文化娱乐业”的概念进行探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娱乐作为人类游戏的天性,是一种与人类进化历史相伴随的古老活动。在中国古代就有“娱乐”之说。《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汉书·司马相如传》:“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师古曰:此以上皆取经典之嘉辞,以代游猎之娱乐。”《汉书·疏广传》:“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汉书·东方朔传》:“得献觴上寿,娱乐左右。”中国古人不仅懂得娱乐游戏的乐趣,还了解娱乐在陶冶人的心性方面的独特功用。《汉书·外戚传·序》:“娱乐,可以娱乐情灵也。”

从古至今,人们尽管在很多时间内进行“娱乐”活动,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但对于“何为娱乐”这样一个命题,人们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娱乐”是一个让人看似明白但其外延和内

涵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概念。在当代学界,对“娱乐”仍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辞海》将“娱乐”解释为:“娱,快乐,欢娱”;“娱乐,娱怀取乐,欢乐。”^①人们对“娱乐”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心态,用一种模糊处理的方式看待娱乐产品和娱乐服务,很少有人对“娱乐”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王晓华在《百年娱乐变迁》一书中使用“娱乐世界”、“娱乐的变迁”等概念,^②但对“娱乐”本身并无明确界定。从全书的内容看,王晓华等人所指的娱乐业,包括戏曲、电影、棋牌、赛马、收藏、宠物、竞技体育等门类。2000年,徐海荣主编出版了《中国娱乐大典》,该书以210万字的鸿篇巨制,涵盖了游玩览探、琴棋书画、歌舞戏曲、花鸟鱼虫、竞技娱乐五个方面的内容。但同样没有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对“娱乐”给予界定。^③

陈建森的《戏曲与娱乐》是专门研究戏曲娱乐机制的专著。作为一部以戏曲本质及其娱乐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中对戏曲作为文化娱乐业本质的“娱乐功能”和“娱乐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学术界对戏曲等艺术品种娱乐价值的认同,但仍没有对“娱乐”的概念进行准确的限定。^④

见诸文献的大陆学术界对“娱乐”进行明确定义和全面讨论的是钟敬文先生。1998年,钟敬文先生在《中国社会生活文库·中国娱乐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的序言中,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娱乐”的概念、起源、特征等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他认为,“娱乐”顾名思义,就是指欢娱行乐。”中国古代的娱乐形式主要是由“生产活动”、“军事活动”和“宗教活动”转化而来,具有“集体性、竞技性、智慧性”的特点。^⑤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333页。

② 王晓华:《百年娱乐变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

③ 徐海荣主编:《中国社会生活文库·中国娱乐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

④ 陈建森:《戏曲与娱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徐海荣主编:《中国社会生活文库·中国娱乐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

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娱乐”概念的讨论似乎更深入一层。西方学者从娱乐产业(entertainment industry)的视野出发,视“娱乐”为与“休闲”、“自由时间”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将“娱乐”定义为使人的心灵与精神产生愉悦快乐经历的所有事物或过程。^①

我们认为,“娱乐”是指欢娱行乐,是指使人精神愉悦快乐的“游戏活动”。一般说来,“娱乐”是指人们为养家糊口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之外的一切休闲活动,但这种“休闲游戏活动”也是有着具体承载物的,并不是虚无。它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两类产品,一类是物质产品,如书画等美术作品,人们在闲暇时间内通过观赏书画得到精神和心灵的愉悦,所以不难理解这类产品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另一类是娱乐服务产品,是劳务形式产品,也可以理解为使人们心灵愉悦的“过程”。

“过程”作为一种娱乐产品具有特殊性,需要予以说明。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此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②

我个人认为,理解“娱乐”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职业生活”与“非职业生活”的区别。“娱乐”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提出,必然要以“非职业生活”为其隐含前提。“游戏”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也是人生的组成部分。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尽管不乏一些“以工作为

① Harold L. vogel. , Entre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A Guide for Financial Analysis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 卷第 1 册,第 435 - 436 页。

乐”的职业化人士,但这种基于“自我实现需要”基础之上的“成就愉悦”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类“游戏功能”。如“工作狂”式的职业经理人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但这是工作而非娱乐,演员在台上也是工作而非游戏,只有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才能算是“娱乐”。“就娱乐来说,它本是人生的一大题目,人在‘谋生’基础上‘乐生’”。^①人类基于“谋生”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基于“乐生”的目标发展艺术。所以“科学与艺术”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双翼”。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游戏”形式配上现代科技手段,使人类的娱乐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少数人占有到多数人占有,到近代最终出现了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娱乐格局的存在,使人们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这即是西方学者十分推崇的“娱乐”的社会属性。

在讨论了“娱乐”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之后,也有必要对“娱乐业”的概念作一探讨。

尽管“娱乐”与“娱乐业”概念相连,但却不是同一个概念。从历史上说,“娱乐”与“娱乐业”不是同一种历史范畴。在中国古代,娱乐活动最早可能起源于原始宗教,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殷人卜辞中的“巫”就是指一个正在手舞足蹈祠神的舞者,所以娱乐的历史与文明史一样古老。但娱乐业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职业集群,具有行业分工的特点,它的出现要比单纯的“娱乐活动”晚得多。

夏、商、周三代(前 2033 - 前 841 年),手工业门类繁多并且分工精细,出现了“百工”之说。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尤其是商周时代金属钱币的出现和商人阶层的扩大,以笛、哨、埙、磬、钟、铃、钹、铎、鼓、笙、竽、箫、瑟、十弦、古琴等礼乐用器方面制品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文化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社会分工催生了文化艺术职业的出现,但直到先秦时期,艺术家职业群体从属于贵族上层,服务于宗教和政治需要,这一时期,服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娱乐业”并没有形成。

^① 陈建森:《戏曲与娱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